

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的日本觀

李政陽

[摘要] 作為中國近代民族覺醒過程中的重要事件，甲午戰爭失敗致使中國朝野救亡禦侮意識高漲，很多知識分子對此進行反思並提出自己的主張。面對戰爭前後不同的國際形勢，中國近代先進思想家鄭觀應對日本進行了分析，並提出師日、防日、抗日和聯日等主張，形成了系統的“日本觀”，其日本觀具有連續性、漸進性和先進性。其中“師日”、“防日”和“抗日”在甲午戰爭前和後都有體現，而“聯日”則主要表現在甲午戰爭後。鄭觀應主張從教育、議院、外交和商業方面學習日本以達仿西之目的，中日之間的歷史互動及日本當時的動向建構了鄭觀應的防日觀，而抗日與聯日主張則是在不同時局下以國家圖存為要的均勢思想的體現。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的日本觀是其“富強救國”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日本觀必不可少的部分。

[關鍵詞] 日本 甲午戰爭 均勢 建構主義 鄭觀應

甲午戰爭前中國社會對日本的主流觀點仍基於夷夏觀。日本1874年入侵台灣、1879年將琉球廢藩置縣後，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對日本重視和警惕起來，^①但輕日思想仍是社會主流。作為中國近代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申報》可以反映出這一思想變化過程。^②雖然當時不乏黃遵憲、黃慶澄、鄭觀應等能正確評價明治維新的知識分子，羅森、王之春、李筱圃、傅雲龍等更是赴日進行了考察，但當時中國社會主流仍未能清晰認識日本明治維新。在已有的研究中，夏東元對鄭觀應在甲午戰爭中的對日態度及提出的戰後對策進行梳理，認為鄭觀應在甲午戰爭中始終持有積極抵抗日本的態度，並利用自己的人脈不斷給當局提供情報消息，在戰後主張加強海防和邊防建設以抵禦入侵。此外夏東元強調鄭觀應關於提防奸細和日本特委的建議。^③夏東元和易惠莉都認為鄭觀應在甲午戰爭前對日本已經有了警惕。^④易惠莉認為在甲午戰爭前鄭觀應筆下的日本具有模仿和潛在

作者簡介：李政陽，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①焦潤明：〈甲午戰前中國文人的日本觀——以“琉球事件”為中心〉，《日本研究》（瀋陽），第4期（2013），頁74。

^②參見〈議林華書館東洋伐台灣論〉，《申報》（上海），1874年6月13日；〈釋中東交涉近聞〉，《申報》（上海），1879年7月24日；〈譯西報論東洋使臣至英國事〉，《申報》（上海），1872年10月11日；〈論日本工藝製造之精〉，《申報》（上海），1894年6月11日；〈答客問高麗事〉，《申報》（上海），1894年7月1日。通過以上目錄，可見思想變化過程。

^③夏東元：《鄭觀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119—143。

^④參見夏東元：《鄭觀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119；易惠莉：《鄭觀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437。夏東元認為鄭觀應看出俄、日奪朝鮮後會侵犯中國，易惠莉還認為鄭觀應已認識到朝鮮將是最大的戰爭策源地。

敵國的“雙重形象”。曹成建認為甲午戰爭後鄭觀應視日本為亞洲強國，與此同時鄭觀應認為中國的自然和人文條件優於日本，但日本的明治維新值得中國借鑑和效仿。^①可以看出，既有的鄭觀應日本觀研究中具有以下特徵：第一，缺乏專題研究，其日本觀多夾敘在其他議題的論述中，在時間和對象上缺乏連續性。第二，缺乏縱向的系統研究，例如甲午戰爭前後其日本觀有無變化？演變邏輯為何？第三，鄭觀應日本觀背後的學理基礎研究尚淺。那麼在甲午戰爭前和後，鄭觀應如何看待日本？其觀點如何形成？主張背後的支撐是甚麼？顯然，這些問題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也對系統地瞭解近代中日關係具有一定的幫助。

一、“何不反經為權，轉而相師”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為重要的報紙，《申報》多次對明治維新的具體措施進行了報道和評價，讓當時仍處洋務運動的中國瞭解了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和啟蒙思想家認識到日本在學習西方知識的道路上已走到中國前面。尤可貴者，鄭觀應在甲午戰爭前提出“師日”的主張，^②鄭觀應在1889年〈交涉篇〉指出：“今日本行之，亦勃然興起，步趨西國，陵侮中朝。”^③在1890年〈商戰〉篇指陳：“考日本東瀛一島國耳，土產無多，年來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夫日本商務既事事以中國為前車，處處借西鄰為先導。……彈丸小國，正未可謂應變無人，我何不反經為權，轉而相師，用因為革，捨短從長。”^④於此同時鄭觀應也對日本的動向有了高度警覺，認為強大後的日本很有可能會侵犯中國，因此希望中國通過以“師日”自強並以此為“仿西”之捷徑。

日本當時人口不到中國十分之一，土地不及中國三十分之一，但卻能在甲午戰爭中戰勝中國，鄭觀應認為其根本原因不在於堅船利炮而在仿西和變通，除了鄭氏，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等也在甲午戰爭後表達了師日的觀點。日本從鴉片戰爭中認識到中國的沒落和西方各國由貧弱到富強，隨後日本派人遊歷西方各國，習其技藝、制度、思想等富強之術，返日後棄舊法行新法，設西學堂，之後便國富民強。鄭觀應主張通過學習日本來仿西，並將學習日本看作仿西的捷徑，甲午戰爭前後其師日的論述可以大致歸納為教育、議院、外交和商戰四類。

鄭觀應提倡建立類似日本的教育體系、學習其教學之法，則人才輩出、國泰民安。“如我國能仿俄國或日本，衰弱之時痛除積痼，幡然一變，各省亦援照西法，廣開學堂書院，認真講求，較盛觀察所設者規模宏敞，則各藝人材何患不出？自足與泰西爭強競勝矣”。^⑤鄭觀應詳細介紹了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教育體系，中學之前日本學校教授學生人倫道德之事，

^①曹成建：〈甲午戰後鄭觀應之日本觀〉，《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貴陽），第4期（1995），頁21—22。

^②參見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49、258—259。

^③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28。

^④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57—258。

^⑤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43。

中學畢業之後按照學生的興趣劃分文科班和武科班。若欲再入文科專科學習，需要讀預備班，詳分為農科、法科、醫學等，然後才能進專科學校，其又精分法、文、理等六門。此外，鄭觀應還着重闡釋日本軍隊的官位制度，重點介紹海軍學校的艦上練習以及隨艦遠航。較之日本，中國學校不分年齡大小通教五經、古文，學校老師的知識範圍狹窄，對國際政治、歷史、技藝等一概不知。鄭觀應建議中國宜仿日本教育體系任命文部大臣專管教育、派二十歲左右通識者出國學習、譯國外實用書籍為教材、設工藝院專習一藝、重文亦重武、建天文台地理會等。^①總之，鄭觀應在尊重科學的基礎上對仿照對象、教學之法、人才甄別等教育方面進行了論述。^②

“議院之明效大驗，有如此者。今日本行之，亦勃然興起，步趨西國，陵侮中朝。而猶謂議院不可行哉？而猶謂中國尚可不亟行哉？”^③鄭觀應認為甲午戰爭的結局足以證明議院對國家富強具有明顯效果，也打破了“議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的固有觀念。^④議院分為上院和下院，上院由國之宗室和官員大臣組成，地方品德高尚和才學之人構成下院。如遇國事，商討決定的順序是下議院到上議院，若上下議院的意見不一則兩院重議，最終提交國君裁定，君不同意，則下發再議。鄭觀應大聲疾呼中國應重視議院的作用：“（中國）苟欲安內攘外，君國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設立議院始矣！……查日本憲法，係本其國之成法，而參以西法，中國亟宜仿行，以期安攘。”^⑤因議院為國人所設，議員也由國人所選，因此議院不僅是君與民的橋樑和紐帶，亦強化了君與民的聯繫，使信息可以通過議院在君與民之間準確傳遞。此外，議院吸納專業人士的意見，又反映民眾的合理主張，可以最大程度實現君民共主，這有助於廣開言路、廣集眾智、廣求良策，發揮君與民的雙方優勢，使其決策更符合實際需要。^⑥“日本無郡不有日報館，我各省當道，亦宜妥訂章程，設法保護，札飭有體面之紳士倡辦，以開風氣”。^⑦“朝議一事，夕登日報，俾眾咸知，論是則交譽之，論非則群毀之”。^⑧議院有報業作為輿論監督才能發揮更大作用，鄭觀應建議中國發展報紙業，將議員所議朝政之意見在報紙上發表，接受大眾的監督和評價。在鄭觀應看來，學習日本設立議院可以通達民情，使上無昏君、下無怨民。鄭觀應首次提出中國要實行議院制，在“體”上進行改良。^⑨

^①王學明：〈試論鄭觀應的教育思想〉，《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上海），第2期（1996），頁77—79。

^②蘇志宏、郝丹立：〈鄭觀應教育價值論述評〉，《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成都），第1期（1993），頁97—102。

^③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93。

^④張澤洪：〈鄭觀應的政治改革觀〉，《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沙），第8期（2001），頁260—261。

^⑤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91、116。

^⑥龍天貴：〈鄭觀應法律思想述評〉，《貴州社會科學》（貴陽），第2期（2005），頁165。

^⑦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23。

^⑧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90。

^⑨黃先鋒：〈鄭觀應議院觀的哲學基礎和思想地位〉，《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海），第4期（1995），頁110—111。

通使代表本國與他國進行談判與溝通，是外交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土耳其、希臘、日本各小國，皆遣頭等公使，分駐各邦，而中土堂堂大國，行走班次乃反居其後，於體統有關礙，於交涉亦動多掣肘”。^①鄭觀應認為通使在我國處於相對較低的地位，不利於外交活動，應該提高其身份地位。^②中國與外國所訂條約對中國極為不利，“較之日本與外國更修條約誠有天淵之隔”，^③“嘗考日本於英國立約，鴉片土不得入境，例止三斤以配藥之需。……我國亦宜設法嚴禁吸食，並仿日本條約，請各國勸英國一律行之”。^④較之日本，我國未與英國簽訂禁煙條約，鄭觀應認為中國應與英國簽訂合約禁止鴉片入境，還應立法禁止吸食鴉片。如何管理外國人在中國的行為才能避免衝突、保護本國權益？鄭觀應建議中國仿照日本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外國在中國的租界未被劃定區域導致被侵佔，^⑤“凡租界之地宜仿日本國例，一經勘定，即劃溝為限，方可杜侵佔滋事之虞”。^⑥不僅僅租界，外國人在中國買地建房處理不當也會產生問題。鄭觀應認為“日本國例不然，非土人或入籍者，不准買其本國之地。中國宜仿行之”。^⑦在傳教士方面，“仿日本定新律頒行，設教部，凡各省各種教士均歸管轄。如不端，准其裁撤，否則不准傳教”。^⑧甚至可以“效日本近年辦理，擇公正教民與華教士代為傳教，無須西人”。^⑨管理在中國的外國人，鄭觀應認為法律是關鍵。“日本維新後刑律大旨改宗於法，而參以英、德。……日本東瀛一小國耳，參用西律憲法，西人亦歸其審理，……何中國猶遠不及日本哉”？^⑩中國應該效法日本修改刑法才能被外國所接受，才能將在華西人列入我國管轄。^⑪“夫日本商務既事事以中國為前車，處處借西鄰為先導。我為其拙，彼形其巧。……彈丸小國，正未可謂應變無人，我何不反經為權，轉而相師，用因為革，捨短從長”。^⑫日本自明治維新後，認識到通商的重要性，只有得通商之利，避其害，才能國富兵強。從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日本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便成為亞洲工廠，經濟總量稱霸亞洲，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政府在原有基建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和完善商業法、金融和鐵路，為商業的進一步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年來日本機器織廠日增，所織各種棉布運入中國銷售者亦日見其夥”。^⑬日本的工業化帶動紡織業發展，機器取代手工，絲產量和出口量成倍增長。“將來日本在內地通商，勢必廣制機器，華人所不知為而不能為，所欲

^①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71。

^②汪菁華：〈鄭觀應外交思想述論〉，《安徽史學》（合肥），第3期（2001），頁48。

^③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14。

^④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74。

^⑤田濤：〈鄭觀應對國際法的認識〉，《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天津），第6期（2001），頁45—47。

^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08。

^⑦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97。

^⑧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88。

^⑨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90。

^⑩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73—276。

^⑪喬素玲：〈鄭觀應與中國法律觀念近代化〉，《比較法研究》（北京），第2期（2003），頁103。

^⑫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365。

^⑬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487。

為而未及為者，恐日人先我而為之。則外洋之利權既為歐西所奪，而內地之利權又將為日本所奪矣！現在風氣之速，甚於迅雷，若不急思籌辦，則日本創之，各國效之，華商必至坐困，無利可圖，可不懼哉”！^①鄭觀應認為中國不重商，應轉而相師，效法日本，振興商務。此外，鄭觀應認為日本重商、衛商的措施包括：仿西法重訂稅則，本國貨物稅輕，他國貨稅重；只准各國在外埠通商；來往貨物必須由日本人驗稅；稅關皆用日本人；通商訴訟由日官審判；設商務局，日商聯盟，遇不公不與之交易。較之日本，中國與歐洲各國通商比日本早，因學校不講求製造諸學，無法生產機器，進而無法進行工業化生產，國家未頒佈商務法令衛商，導致商務落後於日本，中國商人人心渙散，致使他人坐收漁利。^②因此鄭觀應強調效仿日本廣開技術、製造學校，建立新的稅收制度，頒佈助商政策等。

二、“其志叵測，恐終為中國邊患”

1891年鄭觀應分別在〈防海下〉和〈防邊中〉篇中提出要警惕日本，“年來日本講究水師，頻添戰艦，多置軍械，及遣人分住各口，設貿易館，習方言，託名學賈實則交結匪人，時入內地暗查形勢，繪圖貼說，其志叵測，恐終為中國邊患”。^③俄國早已對朝鮮虎視眈眈，然後伺機侵佔東三省，滿足其侵佔野心，“日本亦有心圖此久矣。是朝鮮一隅，為俄、倭所共爭，亦中國所必守”。^④鄭觀應在甲午戰爭前提出防日之說，並成功預言日本會出兵朝鮮，並且鄭觀應多次通過書信向盛宣懷表明要警惕日本。

建構主義認為人類的認知是通過認知主體和認知客體的互動，由認知主體構建和不斷構建起來的“認知結構圖式”實現的，共有知識在構建國家身份認知的同時，也間接影響了國家的對外利益和對外行為。^⑤早在明代日本的浪人、無業流民和亡命之徒即倭寇就不斷侵掠騷擾中國山東和東南沿海等地區。倭寇“數侵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貨財，沿海皆受其患”，^⑥“復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⑦從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亂〉篇中和明人薛俊的《日本國考略·寇邊略》中可以看出，1368至1449年明朝前期倭寇一直持續對中國進行侵掠和騷擾，明朝中期倭寇更加凶殘和放肆。“倭賊百餘自上虞爵溪所登岸……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滄墅關……殺傷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十餘萬”。^⑧到1565年，在戚繼光的領導下，東南沿海抗倭才取得最終的勝利。明代倭寇對中國沿海地區的不斷騷擾侵掠，中國對倭寇的侵犯進行防禦和反擊，中國和日本的互動構成中國認為日本可能會繼續侵犯

^①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398—399。

^②趙秀玲：〈論鄭觀應的商戰思想〉，《文史哲》（濟南），第3期（1999），頁45—46。

^③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04。

^④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07。

^⑤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3期（2006），頁1—16。

^⑥〔明〕嚴從簡；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50。

^⑦〔明〕張廷玉：《明史·日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8342。

^⑧〔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沿海倭亂》，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855。

中國這類共有知識，共有知識一旦形成便會相對穩定的存在於國家的觀念結構中。之後中日兩國先後閉關鎖國，延續着中國對日本的既有觀念。也就是說，“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①以及之後 1874 年日本入侵台灣和 1879 年將琉球廢藩置縣等事件建構了甲午戰爭前鄭觀應對日本的觀念。

日本對中國的“外藩”朝鮮進行侵略，以及之後的甲午戰爭印證了鄭觀應的擔心。面對漫長的海岸線和敵強我弱的狀況，鄭觀應提出分海域設立軍事重鎮，萬一有變則相互呼應的策略。此外鄭觀應認為應挑選水師堂學院畢業的智勇雙全且熟知海戰兵法的將領來統帥海軍，主張海軍定期進行軍事演習，強調各區域海軍的互相配合等來防禦日本。^②在〈海防中〉篇裏，鄭觀應多次強調海軍必須磨練專業技術、備足武器彈藥、時時備戰來防禦外來侵略，海軍將領必須熟悉海軍事務、膽識非凡，借此建設海軍。1895 年鄭觀應在〈海防下〉寫下擔憂：“日本以兵力相脅，要求挾制割地通商，不啻導其先路焉。以一區區島國，魚肉中土尚不難，如取如攜，若俄、德、英、法諸大國久已雄視天下，以中國為可欺，一旦蠢然思動，其勢力較日人為何如？如人之患病，然其發愈遲其患愈重。”^③“及我遣使議和，猶且據台灣，割遼東，索賠兵餉二百兆，反為天下之罪魁禍首。此端一開，凡貪我土地者皆將效尤，以我中國為中矢之鵠。恐此後海疆有事，咆哮挾制之來必變本加厲矣”。^④甲午中日戰爭後，鄭觀應認為日本取得戰爭的勝利會誘使更多國家侵略中國。之後鄭觀應在出刊於 1895 年《盛世危言》十四卷本中加入“朝鮮亡於日本，則日本得隴望蜀，勢必與俄力爭東三省”，和“聞日本之志不淺，商務亦日盛，惟恐不得朝鮮、東三省等處”。^⑤這彰顯了鄭觀應甲午戰爭後的防日觀，顯示出鄭觀應對日本可能繼續侵略中國的擔憂。可以說，鄭觀應較為準確地預測了之後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九一八事變日本武裝佔領中國東北以及日俄為爭奪朝鮮和中國東北而爆發的日俄戰爭。

中國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許土地進行自由買賣，科舉制度使寒門可以掌握政權。日本幕藩土地所有制禁止土地買賣，日本依據等級身份的門閥制度讓政權機構人員難以變更。相較於日本，具有彈性的中國封建制度更穩定，也讓社會變革的難度加大。近代之前，中國是世界民族之林中強大的一員，擁有幾千年的固有文化，對過去文化的眷戀也使變革的力度和廣度不夠。^⑥日本實行自上而下的變革和自下而上的革命，而中國社會的變革沒有得到民眾的深度支持，變革範圍僅圍繞軍事和商業，未涉及制度和文化範疇。此外，日本之前就有吸收中國文化的經歷，對外來先進文化持歡迎態度，“小而巧”的日本對舊文化沒有太多羈絆，因而日本更易進行變革。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高於中國洋務運動時期，相較於日本，中國提供更大的市場和利潤，外國帝國主義列強紛紛覬覦垂涎，

^①沈雲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頁2493。

^②譚銳：〈鄭觀應國防思想初探〉，《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江門），第3期（2004），頁62—63。

^③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427。

^④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433。

^⑤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52。

^⑥余宜斌：〈晚清政府的自強運動——現代化延誤的制度分析〉，《南京社會科學》（南京），第6期（2000），頁35。

而巨額賠償使洋務運動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洋務自強運動的失敗導致甲午戰敗，戰敗日本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無能和腐敗，這誘使更多帝國主義列強發動侵華戰爭。

三、“遠交近攻”與“婚姻之國”

均勢是國際關係中影響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傳統理論之一。在《戰國策》中的〈秦策一〉得到充分的體現，春秋戰國時位於西方的強大秦國與東方的齊、燕、韓、趙和魏國以及南方的楚國形成“七國分立”之勢，謀士蘇秦提出六國合縱對抗秦國的策略，六國合縱即與秦形成均勢。均勢代表人物愛德華·莫爾思（Edward L. Morse）認為均勢是維持國家之間權利平衡的一種對外政策，旨在防止一國控制並危害別國的安全。^①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指出：“均勢是一種特殊的狀態，是由於權勢大致平均地在一些國家之間分配所造成的。”^②在合縱中相對弱小的六國通過聯盟使總權勢與強大的秦國形成力量的均衡，這正如西德尼·弗伊（Sidney B. Fay）把均勢概括為“國家之間權勢的一種大體上的均衡”。^③

1891年甲午戰爭前鄭觀應在五卷本〈邊防中〉中提出“獨力當俄、日之狡謀，不如合力以制俄、日之鋒銳，此連衡之策不可不講也。……結英吉利同心合力以拒俄、日，中英聯盟則與俄、日勢均力敵”，^④和“先與英訂立密約，庶俄、日均有所顧忌，不敢輕於動兵，而後朝鮮可固。朝鮮固則東三省亦固”的抗日觀點，甲午戰爭後鄭觀應在十四卷本重提抗日之說“我中國欲仿遠交近攻之法，宜速結英、德、美以拒俄、日”。^⑤

鄭觀應提出聯合英國共同對抗日俄的均勢思想。中英間聯盟與俄日權勢相當，中國與俄國有着漫長的邊界線，17世紀50年代中俄就開始在邊境交鋒，俄國也從未放棄東進侵華的計劃，俄國通過戰爭、威脅等各種手段侵佔中國領土。對於英國與中國結盟的原因，鄭觀應認為若俄國吞併朝鮮和東三省，必將損害英國在東亞的利益，之後好戰之俄國會西進進軍歐洲，這是英國不願看到的。鄭觀應認為中國和英國存在不願被俄國先後侵佔的共同利益和目標，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當一國與另一國存在關乎生存的共同利益時，聯盟的可能性就會增加。鄭觀應在甲午戰後重提抗日之說以及在兩次鴉片戰爭後依舊堅持結英拒日。這與埃弗里·戈登斯坦（Avery Goldstein）的均勢理論的三個範式之一不謀而合：“在無政府秩序的政治形態中，意識形態和其他政治動機很容易從屬於謀求生存的策略需求。”^⑥“均勢是大多數國家在大多數情況下尋求自我保存的政策”，^⑦當時處於“安全困境”中的清朝第一要務是謀求生存，鄭觀應提聯英抗日主張是其均勢觀的具體表現。

^①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269。

^②魏煒：〈均勢的理論化及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國際觀察》（上海），第1期（2006），頁57。

^③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268。

^④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07。

^⑤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53。

^⑥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270。

^⑦（英）馬丁·懷特（Martin Wight）；宋愛群譯：《權力政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頁125。

鄭觀應的聯日主張主要表現在甲午戰爭後。1895年鄭觀應提出“中、俄、日可世為婚姻之國，合力以驅逐英、法、荷”。^①在十四卷本〈邊防六〉中認為“惟同在亞洲互相攻擊，唇亡則齒寒，徒為漁人得利。中國宜開誠布公，勿念前仇，亦與日合，以踐興亞會之約，庶不為西半球各國所侵害也”。^②在八卷本〈邊防二〉重提聯日“為中國計，亟宜變法自強，結日聯英以拒俄法”。^③在八卷本〈邊防二〉中又強調聯日“中、英、日合，非但朝鮮及中國邊省可固，即日本與英之屬土亦固，東方太平之局不難保矣”。^④

甲午戰爭後鄭觀應為何提出聯合日本的主張？一方面，近代以前中國在東亞範圍內處於先進地位，日本的文明程度落後於中國。中國文化推動了日本古代社會的發展，唐朝時日本就仿照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經濟制度進行文明開化，日本的文字來源於中國，甚至日本自創的片假名和平假名也是由漢字演變而來，相對較高的文明程度決定文化由中國單向流入日本，這就是中日文化的“同文”。王韜“若言日人本中產，或間有之，要未必盡然也。江、浙兩省，密邇東瀛，航海遭風，至其國中，遂留不返”等記載，^⑤以及徐福東渡的傳言則一定程度上證明中日的“同種”。中日文化“同文同種”以及中日同處亞洲的“唇亡齒寒”的地緣關係使鄭觀應“仍冀日本念輔車相依之誼，唇亡齒寒之憂、極力維持，非但中國之幸，亦亞洲之福也”。^⑥“同文同種”、“唇亡齒寒”的論點使得鄭觀應提出結日形成均勢保“東方太平之局”、“不為西半球各國所侵害”。^⑦另一方面，“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蓋俄人包藏禍心，匪伊朝夕，為我邊患亦已數見不鮮”。^⑧從地緣和歷史可以看出聯合日本的原因是因為俄國。兩次鴉片戰爭期間，中國忙於應對英法和太平天國，俄國趁火打劫非法佔領中俄西段邊境有爭議地區、軍事威脅中方開放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口岸，《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侵佔了中國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1871年到1880年中俄因伊犁問題關係緊張，而1874年日本佔領台灣，1875年中日又出現琉球矛盾。面對這種情況當時中國政府特別擔心俄國與日本聯盟，“俄人遠來，專恃日本為後路，宜速與聯絡”，只要“彼國（日本）中立，兩不相助，俄勢自阻”。^⑨為防止俄日聯盟的出現，中國在琉球問題上作出讓步，在當時國人的認知當中，相較於日本，俄國更富有侵略性。此外，“三國干涉還遼”後，1896年中俄簽署《中俄密約》又稱《防禦同盟條約》，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後，俄國違背條約又趁機攫取中國的利益，俄國的背信棄義使梁啟超、康有為、唐才常、張之洞等公開發表聯日抗俄的觀點。當然，在此期間日本主動與清朝“修好”、鼓吹“保全中國”政策等亦推動了聯日主張。

^① 夏東元編著：《鄭觀應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431。

^②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73。

^③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51。

^④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53。

^⑤ [清]王韜：《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日本通中國考》，上海：上海著易堂，1891年，頁593—594。

^⑥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78。

^⑦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53、573。

^⑧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47。

^⑨ 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51。

此外，“結英、日以拒俄，如日有異心則結英、德以拒俄、日，如法有異心則合英、德、美以拒俄、法、日，以期保護東方商務，彼此均有裨益”。^①鄭觀應根據時局處理國際關係以“乘此間暇，大修政令，百度維新，變法自強”謀求生存更能表現均勢範式。^②

“觀”包含在特定歷史場景中對某些問題的認識、理解及解決問題的看法，當歷史時局發生變化時，“觀”亦可能發展或改變。而建構主義和理性主義則對“觀”有着不同的理解，建構主義認為集體共有的經驗、思想和假設形成“觀”，理性主義強調“觀”的優點以及能否應驗。^③顯然，在探析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的日本觀時脫離不了建構和理性主義。甲午戰爭前鄭觀應對日本的明治維新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和瞭解，認為日本在“仿西”的道路上已經走到了中國前面，並提出部分師日的觀點，甲午戰爭後更廣泛地論述師日觀，主張從教育、議院、外交和商業等方面學習日本。關於防日之說，鄭觀應在甲午戰爭前後都有論及，中日在明朝、台灣和琉球事件之間的互動以及當時日本多次的軍事動向建構了鄭觀應的防日觀。鄭觀應的抗日觀在甲午前後都有體現，與文中所述的建構和理性主義視角下的均勢相關。甲午戰敗標誌着洋務運動失敗、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此時日俄關係緊張，日本主動與清“修好”，在圖存為要下，鄭觀應抗日主張逐漸轉變為聯日，當然中日“同文同種”、地緣關係以及抗俄的均勢思想也支撐了其聯日主張。可以看出，鄭觀應在甲午戰爭前提出師日、防日和抗日，“三觀”構成其戰前日本觀，甲午戰爭後主張師日、防日、聯日和抗日，“四觀”共存於其戰後日本觀。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吳浩彭 黃耀岷]

^①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55。

^②王存奎：〈略論中國近代外交思想中的均勢觀〉，《安徽史學》（合肥），第4期（2003），頁34—38。

^③（美）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115—126。